

文明在走廊

■ 渠敬东

[内容提要]走廊是一种文明复合体,走廊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和全局性的学术领域,关涉文明议题。文明所提供的,是一种普遍化的世界图景,是一种存在或认识论上的宇宙观,将人世、历史、自然乃至神圣存在皆纳入总体构想之中。同时,文明也必须具有融合多文化、诸文明的能力,通过保持一体与多元的平衡而获得发展。走廊作为多文明共存的地域,始终具有多文明交通、交流和交融的特征,形成连接与断裂、保存与消融、化合与分解的多重关系,通过在多文明格局中不断学习和借鉴,进而自我转化和再生。西南地区的鸡足山和西北地区的圣容寺,皆为走廊文明的交汇点,连接着古今历史与内外世界,可谓文明复合体构造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文明 文明研究 走廊 鸡足山 圣容寺

一、何谓“文明”?

走廊中国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和全局性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文明议题。走廊是一个文明复合体,就其本质而言,即为一种文明问题的出发点。单就地理分布和历史沿革来说,走廊是一个区域,但这个区域是多个文明相互交通、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区域,涉及古与今、内与外、中心与边缘、本源与流变的多重交互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文明生发、存续、转换和再生的节点,需要做一种新式的现象学分析。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civilization”一词一直被译和作解为“文明”,因此,直到今天,我们所说的文明研究,自然离不开“civilization”所构成的理论化想象,即一种“civilize”或“civilized”的动态过程^①,比如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②,是最有代表性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Qu Jingd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的解释。很显然,从西方文明的角度说,古拉丁文所说的“civis”和“civilis”,是词源学上的根据,即以一种城市化的图景来理解文明,其派生而成的词语“civitas”,则表明了一种所谓文明的属性特征。可以说,在西方文明传统中,所谓文明,即是城市的传统,市民或公民的传统,其衍生而成的公民身份、公民权、集体乃至国家,即构成了文明本身的实质性内涵。^③若进一步溯其源流,自然与希腊人的城邦(polis)实体有关,这构成了文明的基本单元,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体(polity)或政治学(politics),构成了对文明或文明研究的核心观念。无疑,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甚至最完备的奠基者。

近代城市国家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解释的脉络。无论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还是卢梭、孟德斯鸠,皆从公民的角度理解文明问题。霍布斯发表于1641年的《论公民》(De Cive)^④,即是例证。因此,这一文明概念,一开始就包含着公共性的涵义,特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明与生产、产权与交换、国际贸易与资本市场等迅猛发展和极度扩张,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时代到来了。随之,人们的言谈举止、着装服饰、交往礼仪等,也越来越公共化、文明化了,这就是埃利亚斯所讲的故事。

其实,所谓文明化的过程,恰恰印证了文明问题关涉古今之间的纽带,可以说,这个问题的根本,又在于其规定着一种文明对于自身和世界的总体想象或构想,既不可替代,又无法与其他文明完整地共享。同样,文明的逻辑也是一种辩证的逻辑,拿西方传统来看,越是强调和推广其中的公共性,就越会突显自身认同,即我们常说的“identity”的问题。无论是自我和个人,还是群体和国家,甚至是法权或民族等支柱性的观念,都要回到这个问题的界定上来。^⑤马克思就看到了其中的二重性,市民社会越社会化,其私人化的特征也越强,市场越加公共化,就越离不开私有制的基础。诸如“想象的共同体”,或西方普遍开展的平权运动,都有这样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会涉及文明更大程度上的分合问题,涉及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交互关系,问题便更加复杂化了。

对于中国文明来说,从绝地天通以来,政教便不再严格分离了,因此,这里的“教”也不该作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解。显然,“文明”的意思是“以文明之”。《易经》以“中正”的君子来落实“文明”之义,当然,人文必于天地秩序之中才可得以实现,故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孔子讲“郁郁乎文哉”,意思是文明要昌盛在各个方面。《礼记·大传》谓:“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突出了“文教”之意。文明即是教化,从己身和己心,从齐家到治国,乃至最后化成天下,都要由“文”出发。当然,从历史上看,文明不只是儒家的专项,释道二家后来也加入其中,甚至现代化以来,西方乃至更大范围里的文明因子,也都纳入了这个过程。传统上讲的家国天下以及夷夏之辨,说明“大一统”的另一面,是开放的包容性。“大一统”与“多民族”永远是共存的。

以上表明,“文明”这一概念需要辨析,“文化”的概念也需要辨析。西方的“文化”概

念是“culture”，是基于“cult”意义上的耕作或培植，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有“以文化之”之义，与“文明”所表达的涵义大体是一致的。在西方的历史中，文化与文明之别，内含着乡村与城市、初始与晚近、封闭与开放的差异性。^⑥因此，文化是一种功能体，一个族群只要能够为自身创造一种独有且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获得了文化特征。而文明则必须提供一个普遍化或普适化的世界图景，提供一种存在或认识论上的宇宙观，将人世、历史、自然乃至神圣存在皆纳入其中的总体构想。^⑦

也因此，任何一个文化群落，只要没有外部影响，即可作为一个单一体而存在。然而，文明的存在，则必须既有一种多元化的吸纳能力，也有其扩散性、扩展性。文明的这种能力，是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必须要在有效吸纳，融合多文化、诸文明的过程中，建构自身的统一性，保持一体与多元的平衡。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⑧，即是此义。亨廷顿只看文明的扩张性及相互的冲突，却不强调文明本身所必须包含的多元化能力，确实很片面。

文明所具有的这种特质，说明其必然时刻遭遇外部文明的挑战，并持续进行自我调适和更新，否则便会失去其生命力，而仅仅沦落成一种文化。世界上有很多古文明，今天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常见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文明若能始终保持自身的新陈代谢，就必须具备双向启蒙的能力：一是内生性启蒙的能力，自身的守成和革命，即是一种内部的辩证法，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外生性启蒙也是必需的，即通过将自身开放给外部世界而获得进一步生发的给养，传统的天下观中，夷夏之辨所强调的，即是这个层面。

我们可以说，文明所具备的这两种能力，一是“自觉”，二是“自证”。拿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为例：他自称“欧洲文明之子”，首先要从自身文明的内部，如新教伦理，来证成由此开展出的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即资本主义精神。与此同时，他还要通过几乎所有世界已知存在的诸文明出发，进行比较宗教社会学研究，即诸文明研究，来落实以新教催生的理性化逻辑的普遍有效性。^⑨这不仅是一种外部研究，也是一种内部证明，即必须通过文明间的比较分析，来证明新教文明观的效应，因此可以说，一个文明若离开其他文明的比较视角，便无法获得真正的“自证”。

对于中国现代学术而言，也是这样。当年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一方面研究中国文明的内部史，一方面花费极大的心力投入交通史、边疆史地等领域，并采用了考古学、语文学、民族志等多种方法，即是上述文明意识的体现。王国维翻译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中亚细亚探险谈》、伯希和(Paul Pelliot)《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等，协助罗振玉校理刊印《敦煌石室遗书》，与罗振玉依照沙畹所录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区汉晋简牍，加以分类考释，撰成《流沙坠简》，以及陈寅恪多语言考释西域佛教残本等工作，都是以文明论的综合眼光来发见的。^⑩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曾这样写道：“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

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⑩这里所讲的也是文明之构成的原理。

因此,文明的开放性及其具有的吸纳更新能力,是一种在多文明格局中不断学习借鉴的能力,更是一种自我转化、再生的能力。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通、交流与交融,来激活自身传统,自觉与自证同步——形成对自我限度的认识,即是自我提升的起始。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史有周期性的特征,既可能是连续的,也有可能发生断裂,既有上升期,也有沉降期,有治乱,有兴亡。

二、走廊:文明研究的“特区”

由此角度来说,在一种文明的延续发展中,一些边地、飞地、孤岛和走廊等独特区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地位。这些区域,或因有留存文明基因的价值,或因处于多文明交接、交错或交界地带,而获得了多重激发和重构的意义。^⑪所以,区域性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区域本身,而是区域边界的文明交互性。走廊研究的关键,在于多文明或文化的叠合和转化。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区域研究,本质而言是文明研究。在这些地带,文明研究的价值所在,并不仅仅是由文明中心向边缘的输入和传递,更在于文明之间的碰撞挤压,为文明的创造转化提供了契机。

就此,地域上的边缘区域也具有中心的意义。这就是文明研究看似吊诡却最富魅力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文明间的翻译和转译时刻进行着,哪怕是误译,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在物种、技术、语言和思想等各方面,文明的转化工作一直在这里发生,而且常常产生连锁反应的效果。

这其中,飞地与走廊在文明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方中世纪初期,蛮族长驱直入欧洲腹地,摧毁了罗马的古典文明,使整个历史陷入黑暗,文明落入低谷。但因种种情势巧合,有两个重要的文化飞地得以保存和发展,即意大利南部和爱尔兰北部两个区域。6世纪以来,意大利人圣本笃(又译本尼狄克)创立“本笃会”(也称本尼狄克派),服膺于修会的精神,志在研修宗教经籍。同样,在欧洲大陆遭受文化洗劫之时,地处偏远的爱尔兰修道院则继续坚持教授天文、诗律和辩证法,研究拉丁文和希腊语,成为“圣贤之岛”,从而为后世文明复兴保存了火种。^⑫甚至直至今日,爱尔兰的古典文化传统依然影响很大,这片土壤也培育出了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大文豪。

陈寅恪有关“关陇集团”的论述,与之相似。在这一区域,不仅留存了中原文明的内核,也实现了胡汉杂糅、文武合一的政治新形态。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关陇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开创出了文明的新局面。^⑬这段中古史虽以局部的地域为起点,却开创了中国多民族融合的文明构架,产生了总体的文明史效果,有很强的说服力。

同样,走廊更是一种文明交流和交融的重要区域。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地理意义上

的走廊,还是民族、宗教或是文化意义上的走廊,都意味着走廊既是一个通道,又是一个隘口,既是一扇大门,又是一道锁扣。在多文明共存的地域中,走廊是一种辩证悖反的存在,既是连接带,又是断裂带;既是保存带,又是消融带;既是融通带,又是拉锯带;既是化合带,又是挤压带;既可能被人类历史遗忘,又可能形成极其丰富的创造。

因此,我们需要很明确地意识到,走廊地带是文明研究的重要领域,甚至对于一些特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来说,是学术的核心区域。当初,经典汉学家们和我国最出色的学术大家都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正因这些区域的研究关涉国体大本、民族融合、文明创新甚至全球历史构造的所有关键议题。正是走廊区域,在古与今、中与外之间搭建起了综观问题意识,若没有跨学科视野和视域,是无力面对这些问题的。

当然,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这些综观问题,既可以落实到面,也可以落实到线,甚至落实到点来进行。特别是那些具有复合文明特征点,具有最重要的研究价值。这里,我仅举两个例子,一个在西南地区,一个在西北地区,加以具体说明。

三、例说:鸡足山与圣容寺

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⑤讲的是1943年登临云南大理地区鸡足山的纪行与感怀,极为精彩。这篇文章虽然在写鸡足山,费孝通却时时刻刻与自己的中土心态做对比:他在这里所见的景象,所遇的因缘,常常会让你问及从未问过的问题。他看到,村姑、少女、番妇、夷汉、乡绅、僧侣、士兵等形形色色的人群,都来这里朝拜,究竟为何?汉藏群众皆怀虔诚之心,长途跋涉来金殿叩头求拜,又是为何?以至他自己这样不知敬畏的“野汉”,完全成了这世界里的外人。这样的震撼不只是所见,还有所闻,在山上他所听到的几则佛教的奇异故事,不免引起他的惊愕,进而使他产生了知识阶级意义上的反思,发觉被单一知识武装的士人群体,太过愚妄和自负,看不到世界的复杂、丰富和深刻。

费孝通的意思是,鸡足山之行处处给了他全新的教育,作为汉地知识分子,他未曾触碰过这些思想和文化的可能,或者说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能。他受限于以往的认识和体悟,无论是在知识层面上,还是境界上,都需要通过深入理解摆在面前的文明复合体,才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因此,鸡足山之行,亦可理解为一种由外向内的启蒙。事实上,鸡足山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众所共尊,又包容了社会各个阶层,将一切宗教差异、族群差异、阶层差异都加以缓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文明成就。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圣山上投射自己的超越性想象。舒瑜的最新研究表明,鸡足山的佛国系统是明代以来知识精英、中原士人、僧侣集团、土司等身份人群集体合力推动的,在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中,大理地区元代以前的历史,被重新安置了:在山川与府州的二重世界中,府州作为中央王朝治下的现实政治体系,山川则成为疏离于现实的

佛教世界,为府州的治乱循环提供了缓冲和隐逸之地,府州通过山川的超越性满足宗教信仰的普遍需求。^{①6}因此,鸡足山也在作为“同为方夏”的苍山之外,构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多重世界。^{①7}

重构神圣谱系和神话结构,塑造上下区隔并联通的社会系统,将世俗生活与修身理想区分再作结合,以“洞门”的意象将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建构为彼此竞争而又共通的基础,是鸡足山这一走廊文化节点的重要贡献。这充分说明,王铭铭所说的文化复合体^{①8}是存在的,而且,其本身即是一种文明构造,是能够在文明边界吸纳多文化、多民族的文化创新,尤为值得学术界重视,这对于该地区,乃至文明交接带的现代转型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①9}

走廊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来自河西走廊,即坐落于今天甘肃永昌的圣容寺(又名瑞像寺、感通寺)。这一地界,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而且是长达一千公里的河西走廊的最狭窄处,宽度仅数里。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载:“卫唇齿姑臧,形援张掖,襟山带水,战守有资,河西一线,卫其东西孔道也!”^{②0}足可见此地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

对于圣容寺学术价值的认识,得益于杜斗城和丁得天两位学者的研究,以及巫鸿等学者的艺术史成果。圣容寺的开创者是刘萨诃,这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高僧,在《梁书·诸夷传》《高僧传》《佛国记》中均有记载。刘萨诃生于北方,山西离石人,少时放荡不羁,后悔悟出家,于江南三地云游巡礼,归来后随即赴天竺取经求法,取得并翻译多部梵文佛经,可谓这一历史时期集修行、实践和思想为一身,贯穿南北东西之佛教文化的唯一一人。

刘萨诃西行求法,途径河西走廊凉州番禾,预言此地必将山裂,佛像显现,并说“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八十年后,北魏年间,果有佛像出世,却无佛首,北周时期在一处涧水寻得佛首,与佛身相合。北周建德初年,佛首频落,天下大乱。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大胜,亲临该寺拜谒瑞像,将瑞像寺改名感通寺。此后,圣容寺声名远扬,成为佛教中心,获得了政治和宗教上举足轻重的地位。^{②1}

圣容寺的重要意义,在于刘萨诃所创立的番禾瑞像,构成了遍及河西走廊直至周边区域的本土佛教信仰。迄今为止,南起炳灵寺,北至莫高窟、黑水城,包括肃南金塔寺,甚至四川安岳石窟,都有番禾瑞像出现。^{②2}这是佛教东传以来最早也是范围极广的本土宗教形态。刘萨诃的一生,突破了当时政治上南北对峙的文化隔阂,并在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可转译的信仰方式,将预言注入其中,并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在王朝政治、佛教实践和民间信仰之间构建了多重复合关系。直至晚唐五代,我们可以从莫高窟第72窟南壁的图像结构中看到,瑞像已经提升至与下生弥勒比肩的地位,巫鸿称其为“中国宗教史上思考最为深刻的一幅图像”。^{②3}

虽然从历史学上,我们可以详细辨析刘萨诃和圣容寺的源起流变,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何番禾瑞像及其信仰,是在东西孔道这一河西走廊的关键节点上形成的,它如

何协调、融合了佛教早期发展中的南北思潮,又如何 在佛教传播的东西之间架起桥梁,并由此孕育了一颗本土化的种子,在此后的千年历史中不断延续演化。换言之,如何将来自北方地区的“胡神”,与经由南方江左各地培育成的“高僧”相结合,如何将本土的地狱信仰与印度佛教的涅槃学说相结合,是刘萨诃和圣容寺的贡献所在。^④这说明,刘萨诃是佛教从小乘向大乘过渡的代表性人物。^⑤唯有此转换,佛教与王朝政治、制度文化、民间信仰之间的融合才能走出一条中国文明特有的道路。

四、小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明在走廊,就是不同文明及其语言、文化、宗教和族群的载体相互交通、交流和交融的生态构成,也正是在这样的区域里,文明会发生碰撞、挤压和变异,也会发生转译、移植和再生。走廊是激活历史的地带,也是文明发展的希望所在。

走廊虽为不同核心文明的交接带,且大多处于边缘地带,但就其所孕育的文明生发的可能性,及其复合关联的深度、厚度和广度来说,却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研究的潜力,多学科、多领域和多视野的问题化过程在此发酵酝酿,而终成洋洋大观。走廊是文明研究的学术重镇,这个结论是不为过的。

注释: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5—40页。

②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与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④ 霍布斯:《论公民》,应星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⑥ 参见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8-50, 76-82。威廉斯的说法很有趣,他认为“文明”概念的提出,是启蒙运动的结果,是对人类的世俗性进化和发展的强调,是明显基于现代性的判断,而“文化”概念,则是浪漫派对启蒙运动的反叛,确认了人类发展之多种途径的价值观。

⑦ 黄克武在考察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文明和文化观时,发现了一种恰恰相反的趋势,即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以西方中心、线性演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转变为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之“文化论述”。参见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 ⑧《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 ⑨参见马克斯·韦伯：《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载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⑩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31—147页。
- 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 ⑫史念海：《河西与敦煌》，载史念海：《中国的河山》，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铭铭：《藏彝走廊——多学科区域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 ⑬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6页。
- ⑭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 ⑮费孝通：《鸡足朝山记》，载《费孝通全集》第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 ⑯舒瑜：《山何以“灵”：文明共生视角下的云南鸡足山》，载《民族学刊》2021年第12期。
- ⑰舒瑜：《“共见之处”：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未刊稿。
- ⑱王铭铭、舒瑜（编）：《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
- ⑲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63卷，“陕西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 ㉑陈清香：《刘萨诃事迹与番禾瑞像图像源流》，载杜斗城、丁得天（编）：《丝绸之路与永昌圣容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 ㉒丁君年、丁得天：《甘肃永昌圣容寺：千年古寺 丝路名刹》，载《中国宗教》2016年第2期，第68—70页。
- ㉓巫鸿：《瑞像的历史叙事》，载巫鸿：《空间的敦煌：走进莫高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
- ㉔张善庆、吕德廷：《刘萨诃入冥图像与文本——以日本极乐寺本〈六道绘〉为中心》，载杜斗城、丁得天（编）：《丝绸之路与永昌圣容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㉕丁得天：《刘萨诃、番禾瑞像与圣容寺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学者论坛，2020年11月6日，参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网站，<http://www.ihss.pku.edu.cn/templates/learning/index.aspx?nodeid=123&contentid=3934&page=ContentPage>。

责任编辑：刘 琼

from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which had raised the eyebrows of Cai Yuanpei, Wu Wenzao and other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origin and continuous influence of the image of an isolated islan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argues that disciplinary researches deviated from their original agenda would lead to cognitive crises. To overcome such c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go back to the basics and start anew.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e image of a composite in the old theory, it will b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stor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of communities, cities, regions, nationalities, corridors, and other locations, and to break dualism with relational cosmology.

Keywords: ethnology, sociology, nation, image of an isolated island, composite

Civilization in Corridor

58

Qu Jingdong

Abstract: The corridor is a civilization composite, and the study of the corridor is a comprehensive and encompassing academic field pertinent to the issue of civilization. What civilization offers is a universal picture of the world, an existential or epistemological view of the universe that incorporates the world, history, nature, and even divinity into an overall conception. At the same time, civilization must also be inclusive and develop through a balance between unity and diversity. As a region where multiple civilizations coexist, the corridor has always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 transportation, interflow and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witnessing at once connection and division, preservation and solu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Multiple civilizations continuously learn from each other for self-transformation and self-revitalization. The Jizu Mountain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Shengrong Temple in the northwest are both the intersection of corridor civilizations, connecting the ancient with the modern and the inside with the outside, therefore providing good examples of what a civilization composite looks like.

Keywords: civilization, study of civilization, corridor, Jizu Mountain, Shengrong Temple

Corridor and Passage, A Spati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China has Come about

66

Ma Guoqing

Abstract: Corridors and passages are important research units for apprehending the integrity of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 Silk Road on land and by sea spanned mountains, seas and grasslands, facilitat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China, the ethnic corridor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spati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or recognizing the overall integrity, unity, and comm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erspective also serves as a vital research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behind how China has evolved into its current form. Corridors and passages are liv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aces and living historical traditions, which constitute an im-